

平明出版社的文学译介与出版活动考释

操乐鹏

【作者简介】操乐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20.1.66~83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的出版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私营出版业亦未被全盘纳入一体化的轨范。此时的文学译介与出版处于多元混杂的状态。这其中,1949年底成立的平明出版社显现出独特的姿态。在当代出版格局的重建中。私营的平明出版社仍延续着版税制等民国出版的向例,以巴金为中枢汇聚起一批卓越的著译群体,拥有甚至超过国营出版社的编辑译校力量。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文学译场中,平明出版社既有趋时的一面,又始终坚守译介的文学本位与经典意识。在巴金眼中,他与平明出版社的初衷都相当单纯且理想化:“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①本文即聚焦于平明出版社的成立运营、译介出版、组稿约稿、翻译校阅、丛书编纂、人事关系等,将关涉平明出版社的译家、译业与译事过程化、细节化,既在前人论说平明之详尽处继续着墨,又对平明勾连的文学翻译境况略加注解、申说,以追索和呈现平明出版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译场或合流或抵牾的参差错杂的状况。

一、平明出版社的创立

据《平明出版社第一次综合报告》:“本社是1949年12月由15位对出版事业有志趣之同志出资,根据旧公司法组成平明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一五八八股,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大会选出李芾甘、王辛笛、尤淑芬(李健吾的夫人)、李彩臣、陆清源等五人为董事,汝及人、徐成时等二人为监事,并推李芾

甘为董事长,巴金为总编辑,李彩臣为总经理,海岑为编辑,另聘请了两位职员办理业务。”^②报告中的陈述简明扼要,有关平明出版社创立之缘起仍有两方面因素不可忽略:一是新中国成立初的文学出版语境,对私营出版业的宽容和扶助是平明出版社成立的充分条件;二是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③(以下简称“文生社”)的决裂,这直接推动了巴金深入参与到平明出版社。

1949年10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在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之下,私营出版事业是有事可做的,他们应该努力来参加这个事业,不应该消极彷徨。”^④黄洛峰在会议上号召发行工作要公私兼顾,充分运用私营出版业的力量^⑤。出版总署制定的1950年工作计划也体现出对私营出版业的重视:“适当地扶助和组织私营出版事业,建立公私合作的关系,使私营书店均能担负起一定的人民出版事业的工作。”^⑥另一方面,就全国出版业来看,以私人资本经营者占优势,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家为最大私营书店。估计生产能力,当占全国生产力之半数以上”^⑦。可以说,建国伊始,无论是文化界对待私营出版业的态度与政策,还是私营出版业自身远超国营出版业的力量,都是对私营出版社的蓬勃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建国前夕,巴金就曾说“本来在这时候我们应有新的计划,出点新的书”^⑧。假如不存在巴金与文生社的矛盾,本也该是文生社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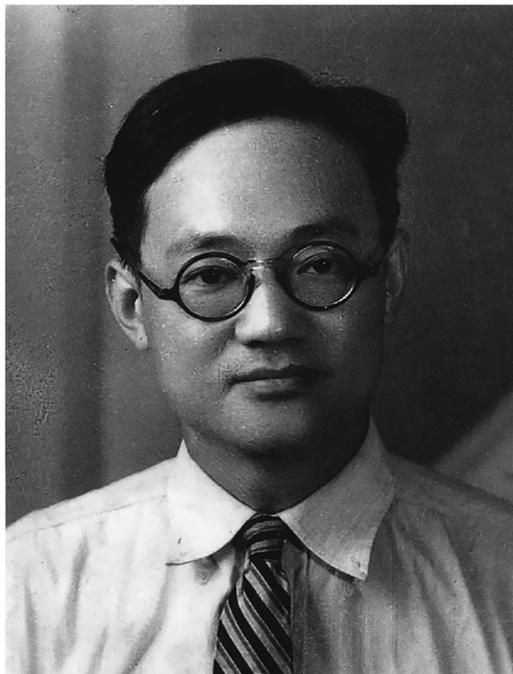
大约自1940年代中期起,巴金与吴朗西裂隙渐

生,至1950年代初近乎“闹翻”^⑨。1945年,在《散文诗·后记》里巴金隐约流露出一丝对文生社的无奈:“十年流矢般地过去了。我没有能够摆脱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终没有打好一个牢固的基础。”^⑩1946年6月,巴金在致索非信中较为直接地吐露了二人间的不合:“对‘文生’我与朗西意见相差甚远,但他总是弄两个月又跑开,过几个月又回来。所以我们的事情永远弄不好。”^⑪黄裳在回忆与巴金在一起的日子时,曾记起,“有些老朋友如吴朗西、朱洗,也有时来。巴金和他们常有争论,有时候辩论得很激烈”^⑫。到了1949年,巴金的沮丧在给田一文的信中暴露无遗:“我对书店的兴趣差得多了”,“文生社的事我无法管,也管不了。现在除了慢慢地在看校样外,我与‘文生’可说没有关系了。小康已被朗西赶走。三月起朗西组织社务委员会,自任主委……我想让他们搞一个时候也好。我从前对你说过,绝不让朗西管文生社事情,但如今我实在对付不了他们,只好认输了”,“这半年来,‘文生’虽然受了很大损失,但我个人却清静多了”。^⑬在写给萧珊的家信中,巴金同是颇感悲观,预备放弃文生社。

巴金并不想将自己与文生社及吴朗西的矛盾公开化,因而只在个别书信和译著的前言后记中偶有涉及;时过境迁,巴金又每每选择回避此事^⑭。这其中,致田一文信,以及《六人·后记》提供了难得的较多线索。先看《六人·后记》:“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业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申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到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但我至今没有倒下来,至今还能够工作,那是因为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还有着许多别的朋友,而且也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我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工作骄傲过。但我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完全否定”,“他们甚至不让我有时间在发印前仔细地校阅我的译文。但是对读

者,我除了告罪外,别无他话可说”。^⑮满是虚耗于人际纠葛的疲惫和不被理解的委屈。汪曾祺当时读到这篇后记,感受到了这种悲凉:“前两天在我们这儿的图书室里翻了翻《六人》,看了那个后记,觉得很难过,看到您那么悲愤委屈,那么发泄出来……强烈极了,好些天都有那么个印象。”^⑯王西彦也写过信安慰巴金:“这十余年来,您在文生社上面所耗费的心血,有目共睹;自然,这些年您所受的委屈,也应该是不难想象的。”^⑰

《六人·后记》多抒自家心绪,致田一文信则多涉文生社的校稿、出版等事务,“我看稿校稿,而出版与收稿则由他决定。譬如我决定收的稿子,他不要也只好退给作者。现在排好打好纸型的稿子也有几部,他不肯印,我也无发言权。这些事情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我不愿意再跟他吵架,一切都让他。但是今年来‘文生’在他的领导下只有越弄越坏,而且同事们无事可做。可见问题在领导人不行。我虽然跟他合作,但‘文生’是在他领导下面。我无权无功夫管别的事。他自己不好好检讨一下,却只是颠倒是非、怪这怪那,所以最后弄到连同事的薪水也发不出去了”,“但是我把‘文生’交出以后,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⑱对文生社的运营,巴金很不乐观,



1946年,巴金在上海

“我好久都没有过问书店的事情了,我的兄弟采臣也离开文生了”,“文生社内部人事纠纷闹了半年还没有解决,最近吴朗西把书店抓到手里,却也拿不出一个办法,情形更差。所以半年来出书很少。不过因为根基较稳,文生社维持下去也不很难。如果弄不好,再过两三个月会改组的”。^①巴金离开文生社也就势有必然,“以后光阴有限,我得宝贵它。所以文生的事我决定一句话也不讲,放弃所谓‘股东’的一切。”^②

巴金离开文生加入平明,不单是念及与李采臣手足之情,“不能眼看他失业”^③,更是赓续自己的文学翻译与出版事业的绝佳契机。不夸张地说,巴金才是平明出版社的灵魂人物。他的加入,为平明的文学翻译与出版注入了经典意识,带来了品质保障。平明出版社的资金流动、组稿校稿、编辑组织等事务,很多都是李采臣咨询巴金后由巴金决定,或是巴金直接定夺。也难怪外人会以为平明出版社是巴金创办的。常为论者所引的两则史料亦可佐证巴金之于平明的重要价值。一是丽尼深知要好好组织稿件,非巴金不可:“真好的译稿必须老巴才可以拉来”,“‘文生’如果当初也是随便拉译稿,绝无今日的地位”,“除了老巴,谁能随便改动别人的稿子?谁敢?即使译错了也不敢随便改动的,译者首先就不伏[服]”。^④二是焦菊隐在得知巴金脱离文生后,也希望跟随巴金,对“今后文生所出的书,是否仍能维持以往的标准”大有疑虑,希望将自己的译稿挪至平明,“原则上,弟的书,不论是译的或写的,愿意永远跟着吾兄走,你到哪一个出版社,或你自己另办出版社,弟自动愿意将书移过去”^⑤,可见对巴金之极度信任。此外,平明出版社的地址,最初设在上海汕头路82号^⑥。这里是陆清源的居所,其父陆士谔当年正是在汕头路82号行医、居住^⑦。1953年,平明出版社迁至延安中路1157弄5号。在“三反”“五反”中,平明出版社被定为基本守法户。

二、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及其组稿与译校

在1951年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做了《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斥责了出版界的缺失:编著水平落后,缺乏严格的工作制度,审稿做得很不仔细,校对也做得很

不认真等^⑧。在1950年代初期私营出版社数量猛涨、大量出书牟利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出版界的乱象和通病。汝龙对此有明确的警惕,告诫巴金道:“最近看到第一、二期《翻译通报》,感触很多。此后各书店的编辑工作,特别是民营的,恐非大大加强不可(译书人自更要小心谨慎)。”^⑨自成立后,平明不断吸收、壮大编辑人员,汇聚起一支有实力、有担当的编校精锐,比之当时任何一家出版社编辑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52年全国图书出版基本数字总表》关于各出版社编辑组织的统计中,大多数私营出版社编辑组织的专职人数仅有一二人(有的无一人),平明的九人显得格外突出^⑩。

1950年,巴金告诉田一文,“平明”已经有了两个编辑:汝龙和海岑。海岑即陆清源,一直任职于平明出版社。汝龙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在担任平明编辑的同时,作为苏州人的他还先后任职于江苏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汝龙每两周去一趟无锡给学生上课,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讲文艺理论、讲《少年维特之烦恼》。白天上课,晚上便开始伏案译书。汝龙常常请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的同事廖序东给译稿把关^⑪。1953年,汝龙担任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汝龙的志趣只在翻译,很快便辞去教职与编辑工作,心无旁骛地闭门译书,间或也会给平明校阅译稿。1952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祝庆英受邻居萧珊的推荐和邀请(祝家与巴金家当时均在霞飞路),进入平明编辑部工作。祝庆英是祝世康^⑫之女,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在平明主要从事英文编校工作。祝庆英在译校上得到过汝龙的指点,也承续了汝龙、巴金等人一丝不苟的作风,“她做编辑像吴劳一样认真,能提出你细小的错误,还会试译两句,提议这句话似乎可以这样译。”^⑬毕业于中法大学的郝运经校友王道乾向萧珊、巴金引荐,于1953年4月加入平明任法文编辑。与郝运同样担任法文编辑的还有成钰亨。1954年,吴钧陶在给平明投递译稿被退回后,却受李采臣之邀,担任编辑部助理编辑^⑭。和吴钧陶同时进入编辑部的还有杨之宏。后者毕业于牛津大学,是杨宪益的牛津同学。杨之宏和妻子陈漪均在编辑部工作,杨之宏一度任编辑部副主任。此外,华东师范大

学外文系的叶麟鏊和大连俄语专科学校的潘勋照二人毕业后均进入平明任编辑。康嗣群离开文生社后,也加入平明出版社编辑部。

除了担任总编辑的巴金和辞去职务的汝龙,陆清源(海岑)、康嗣群、成钰亭、杨之宏(西海)、陈漪(莲可)、郝运、叶麟鏊(鹿金)、潘勋照、祝庆英、吴钧陶构成了平明编辑部的常驻阵容。协理编务的萧珊,主编平明出版社各类丛书的靳以、黄裳、潘际炯等,帮忙校看过译稿的卞之琳、巫宁坤、马云、李济生、李采臣、傅雷、沈仲九等,均可算作平明出版社编辑工作上的中坚力量。

平明出版社的文学翻译主要有三个稿源:其一是巴金等人的约稿、拉稿,也包括平明出版社内部人士的译作;其二是译者自行投递的译稿;其三是再版其他出版社的译本。伴随出版业公私合营的不断推进,像开明书店改组后某些书就无法再出版,巴金便从中择取一二交平明重印。“新译文丛刊”中高尔基的《秋叶集》《同志集》等便使用了开明的版本^③。又如傅雷将巴尔扎克译作的版权从三联收回交平明再版。译者自行投递译稿又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焦菊隐、傅雷、曹葆华等译坛名宿,冲着平明的口碑,心甘情愿在平明出版译作,且以此为荣^④。另一方面则是后起的译者,因刚出道无名无势,大都四处寻觅着

自己译稿问世的契机。平明延续了文生社发掘新人的惯例,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译者,编辑部也一视同仁,以翻译质量作为是否接纳的标准;哪怕是达不到出版要求,编辑部也都会给予及时的通知和详尽的修改意见。徐汝椿和陈良廷将合译的《都会一角》投给平明出版社,“巴金特别好,自己看稿子,还请语言专家看。”^⑤吴钧陶《圣诞欢歌》的退稿信中也附有具体的修改意见。这也常常使得译者多年后仍然感到平明出版社的温暖;与店大欺客的衙门样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迥乎不同^⑥。此外,平明的自约稿和拉稿占了相当的比重。

1950年代初,巴金不仅两次入朝鲜(1952年3—10月以及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而且多次赴京开会。平明的相关事务常常是巴金致信萧珊和李采臣,可谓是远程过问和指导。但并不是如巴金所言“我远在朝鲜也管不了事情”,巴金还是“管”了相当多的事情:身在朝鲜,不忘提醒萧珊“见到西禾请催他早交译稿并拉稿”,“见到王道乾,则请他多译新的作品”;人在北京,探听得出版讯息,也趁机为平明作伐,“在北京听见说杨必事不成功(郑振铎讲),那末她的译稿可以给平明了。”^⑦萧珊在上海为平明倾注心力,尽心尽责:“我已开始为‘平明’拉稿,王佐良有信来,他有意搞一点古典作品”,“姜桂依也愿意为平明



1952年4月12日,巴金(左)和黄谷柳在朝鲜开城战地(图片由巴金故居提供)

搞一点古典作品”，“只是他们都很忙，都得明年交书了”，“我把平明的方针给他们谈过一下。我也叫王佐良拉稿了”。^⑧萧珊出色地完成了巴金对她的期待：“而且你能组织一批稿件，对平明也有好处。”^⑨

除了巴金萧珊夫妇，平明编辑部成员及各路友人都纷纷为平明拉稿约稿。如李采臣请郑永慧译亚马多的小说；卞之琳推荐罗大冈翻译萨特的戏剧；焦菊隐亲自将英若诚的译作《奥瑟罗导演计划》转交巴金……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在文生社出版后，巴金亦有替平明向周作人约译古典著作和《昆虫记》的意向。周作人在给康嗣群的回信中写道：“巴金君雅意至可感，明春能分得工夫，古典书很想译，未知出国何时可以回来，希望那时可以呈教。昆虫记因系大部，一人不能担当，势必须与人合作，此事亦想进行，但一时恐难着手，平明有此盛意，容从长计画，未能即行决定也。”^⑩

瞿白音在译作《我的艺术生活》的“前记”中，感谢了平明出版社编辑部的诸位同志：“他们有的细心校阅译稿，有的帮助解决疑难，有的代找参考资料。这译本的完成与出版，他们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⑪瞿白音确乎道出了平明编辑们的关键贡献：提供原版书等参考资料以及精审的译校。

翻译首先需要外文原本，这一理所当然之事在进入当代后却变得困难重重。1950年11月，国际书店成立，次月其发行处正式开始运营。国际书店在新华书店总店直接领导下“统筹办理国内外书刊的进出口经销事宜”^⑫，实则垄断了外文书刊的进口，并以严苛的尺度形成了严密的过滤网。国际书店并不怎么“国际”，它以苏联文学为进口大宗，即便涉及西方名著也只买进俄文译本，西文原本少之又少。有了这堵文学交流的隔阂之墙，难怪“翻译家都感到原材料荒”^⑬。此时，巴金丰赡的藏书和无私地分享，使诸多译者受益良多。巴金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大家，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的藏书室和全是外文书的藏书橱就曾让黄裳惊叹不已^⑭。跑旧书店是巴金的嗜好之一，这可不是为了觅得珍本供自家赏玩。萧乾就说过，“你一到上海，自己感冒着，就先替朋友张罗买书的事——买定了，才躺下，很感动”^⑮。其实哪里是“一到上海”才如此，在朝鲜时巴金也屡屡让李采臣、

李济生或萧珊代购外文书^⑯。巴金将难得的原版书分享给友人，以助其译事：托汝龙带法国版契诃夫剧集给陈西禾；将插图本普希金作品带给查良铮；为王道乾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提供法文社会主义辞典作参考；徐成时要译尼克索，巴金写信给李采臣嘱其寄书给徐；把屠格涅夫俄文版借与李健吾参阅；萧珊也曾寄赠法文版司汤达小说给巫宁坤……



1956年，翻译家汝龙在北京中山公园签名售书

对待译稿，平明的处理一丝不苟。即使是好友的译作，也会找人审阅把关^⑰。如请卞之琳看了查良铮译的《波尔塔瓦》，“他觉得比得过一般译诗，那末就够了，我想再寄回去给查改一下。”^⑱巴金受李采臣委托，让巫宁坤校阅《哈姆莱特》曹未风译本的第一部。这其中还能见出不同译家各自的翻译诗学所在。巫宁坤就认为曹译莎剧“散文部分还好，韵文部分生硬”^⑲。萧珊和姜桂依、巫宁坤有关译文的通信往来，亦触及翻译技巧、合译等问题。当然，译校不可能总是这么和谐，常有矛盾掺杂其间。如初出茅庐的郝运，作为《红与黑》罗玉君译本的责编，将发现的差错和瑕疵都写在纸条上，却因“人微言轻，审阅意见大都没被采纳，书照常出版”^⑳。

正如丽尼对文生社的评价：“有真正好的译稿，不十分好的也带着好了，‘文生’的译稿并不本本都理想，但因好的较多，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不同。别的书店何尝没有出古典名著，只因多数平庸，所以不能建立信誉。”^⑤平明出版社的情况也类似，既有傅雷、汝龙、巴金等当代一流译家的译品，得以撑起平明的整体质量和信誉，但也有部分平庸乃至劣质的译作，遭受过读者的批评。焦菊隐就曾看到这样的译本，听到了这样的批评，在致巴金信中以稍显夸张的“一页不能卒读”形容之^⑥。巴金对于译本之优劣心知肚明。萧珊在建国后自学俄语、从事译事，巴金对萧珊译文的评价是有所保留^⑦。杨苴的译作也不能让巴金满意：“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可以译得更好一点。汝龙替你稍微改动一下，我也动了几个字，想来你也不会怪我们。”^⑧巴金更希望杨苴认真校改略显轻率的译作。

三、文学翻译的重出与复译

平明出版社对译作的组稿、约稿往往牵涉到译本之多寡与重译之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尽管周作人、章锡琛、叶至美等认为重译书似乎也没多大坏处，多个译本并存也是好事，但为了杜绝滥译抢译的投机行为，也为了节约人力物力，重译、复译常常被视作不应提倡的译介活动。时任出版总署翻译局局长的沈志远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做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明确指出：抢译乱译、重复浪费是目前翻译工作的重要缺陷之一。沈志远还特别以高尔基为例指出：“文学方面高尔基的作品，译本重复的甚多。‘夜店’的译本竟多至十种左右！”^⑨《翻译通报》为此专门辟出“翻译消息”、“翻译计划”等栏目，即时刊载个人和出版机构拟进行、正在翻译或已经完成的译著书目和计划，以尽量避免出现译本的重复和抢译现象。平明出版社在选择译本时，也就不得不有该译本是否为重译本的考量。

1950年，焦菊隐在致巴金的一封信中有言：

巴金兄：

连得两函，指示各点，感激不已。第一信弟已函覆[复]，想已收到矣。年来弟因天真，无形中得罪人，自己尚不知道，今经兄籍译书事指出，第十二分感谢。今后不但这一方面，即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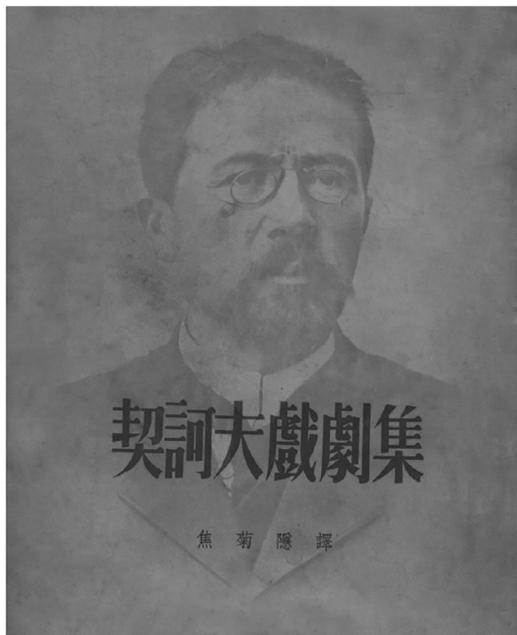
面也都应当把好胜心理改改，免得吃力不讨好也。兄之启示，当永铭不忘！

这次想再译那几本书，实因对文生及平明的心，但热心中忘记了影响于友人间的情感，同时也忽略了有的书仍在发此文。巴甫连柯的《草原上的太阳》日内即寄上，但，如寄到时已有人译好出版的话，即就置之不必再印！以后再设法为平明弄些稿子可矣。

又，因此事而想起高尔基的几个戏，恐怕健吾兄有误会，请代解释一下。高尔基的七个剧本，恐怕我所有的耶鲁大学译本，正和健吾兄的一样。老早一虹兄嘱弟一一译出，当即译了两个，可是弟有一点不愿交天下，因天下板[版]本太不美观，所以询问吾兄，兄回信言健吾已全部译出，弟又去问一虹兄：说健吾已有译本，天下是否仍要，一虹兄言无妨，因为早约好的，不便在弟译出后不要。因此弟即交天下两本，而其余的便绝不再动笔了。第三个应交天下的剧本，便改译苏联其它[他]作家而别处无人出版的《谢尔盖叶夫工程师》了。这是实际经过情形，并无丝毫恶意或竞译心理，务请转达健吾兄，万勿误会为荷！^⑩

信中所谓“年来弟因天真，无形中得罪人”，当是指焦菊隐决心将《前线》《俄罗斯人民》《莫斯科性格》《俄罗斯问题》这四部已有人译过的剧本重新翻译，并认为“我想这几个剧本，由弟译出后，一定可以卖过以前的译本”^⑪。这种“好胜心理”似乎引得他人不快，巴金在写给焦菊隐的信中应该是提醒焦注意此事，避免得罪他人。在高尔基戏剧的翻译上，焦菊隐也赶忙解释一二，声明并无与李健吾争抢之意，且在另一封致巴金的信中说：“又高尔基的戏剧，知健吾兄已翻译，所以不再译了。”^⑫已经译完的高尔基剧作由葛一虹的天下图书公司出版^⑬，葛一虹并不介意译本重出。由于有过因重译得罪人之事，当焦菊隐再询问巴金时，就不忘问及该书是否已有其他译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是否已有全译本出版(孟斧部份[分]译本不算)，请见示。”^⑭巴金的建议想必是希望焦菊隐致力于苏联小说的翻译。巴甫连柯的《草原上的太阳》是一例，焦在另外的信中还曾提及：“我今后

一定在最近给你寄一部苏联的小说稿子去,请放心”,“我想给平明译的,是E.kagake vrfeh: I storle(1948),一九四七年斯大林奖金小说,法文版。这本书有没有人译过,请通知我,以免重新于平明有影响”。^⑥焦菊隐颇有惊弓之鸟的感觉,每每都要小心翼翼地打听是否早有译本。由焦菊隐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若干册也被列入平明出版社的编辑出版计划中。



1954年,焦菊隐因契诃夫戏剧复译事再次陷入纠纷。焦菊隐把他译的《契诃夫戏剧集》递交平明,平明出版社担心有重译,向华东新闻出版局请示,华东新闻出版局的指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将出版契诃夫的剧本,为避免重复,要焦译本暂不付排,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出版,则可付排。”焦菊隐又联系了人文社的楼适夷。楼适夷的看法是:“目前翻译重复现象确很严重,必须逐步纳入计划正轨,但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古典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剧本,如果同时有一两种译本,互相参照,不能认为是浪费。”平明出版社却并不这么看,“即使华东新闻出版局同意出版,如新华书店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另有译本而不予发行,则该社损失过钜。”^⑦建国后,出版界一项关键的调整是出版、印刷、发行的三分。在国营出版力量薄弱的情形下,私营出版社便通过私营发行业形成了“一个脱离国家计划轨道的市场”^⑧。对私营出版社放任自流的态度被认为是在公私关系上犯了右

倾错误。自1953年起,出版总署要求新华书店在发行上调节公私关系,“逐步降低进销私营出版社出版物的比例”^⑨。加之新华书店这类国营单位本身就瞧不上私营出版社,多有排挤后者的现象,可以说,平明的顾虑绝不是杞人忧天。无奈之下,焦菊隐只得求助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出版总署随后也复函华东新闻出版局:“对于焦菊隐这样的作家与平明出版社这样的出版社,我们应该很好地团结,以利于推动作家进步和出版社的创造”,“对于有历史地位的出版社与比较有名的翻译工作者的译品,则要慎重将事,如不可能避免重复,同时出两种译本也可以”,“新华书店必须经常地注意各类读物,特别是著名作家有一定价值的著作的进销存发情况,不要使得人们感到新华书店有排斥作家书籍之感”。^⑩最终,焦菊隐的《契诃夫戏剧集》由平明出版社于1954年6月出版,印数为3500册;人文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⑪各单行本印数均在5000册左右。

此类重译复译事尚有很多。如1953年赵瑞蕻与杨苾合译的《瓦普察洛夫诗选》,已由巴金看过译稿,却因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了另外的译本,赵、杨合译本也就未能在平明出版^⑫。又如郑永慧在1950年代初将巴尔扎克《钱袋》《猫球商店》《苏城舞会》的译稿寄给平明出版社。据郑永慧回忆,“译稿寄给出版社以后我心内稍感不安:因为我对出版界情况不很熟悉,不知这3篇小说以前是否有人译过,在当时,一本书重复翻译出版是不可能的。”^⑬很快,“李采臣便有了回音。李采臣肯定了郑的译文,但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为难:平明已经出版傅译的许多巴尔扎克作品。尽管这三个短篇傅雷均没有译过,但傅雷似乎并不乐意看到他人在平明出版社翻译出版巴尔扎克的作品。”^⑭好在李采臣将郑的译稿介绍给了韩侍桁。三篇译作后由国际文化服务社以《钱袋》为名出版。

当然,也有例外。吴钧陶在进入编辑部之前,曾将父亲藏书中的《圣诞欢歌》译出,投给平明出版社。此后,吴接到了平明编辑部详细的退修意见,便着手修订译稿。《圣诞欢歌》这部狄更斯的小说早在1945年就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方敬译本,1950年代又有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汪倜然^⑮译本。吴译《圣诞欢歌》于1955年5月由平明出版,列入“新译文丛

刊”，看来未受其他译本的影响。其实，焦菊隐信中提到的巴甫连柯《草原上的太阳》也是译本众多^①，平明交给焦菊隐的苏联短篇小说译介计划也不是平明独有^②。无论国营还是私营，往往是各家出版社一哄而起。质言之，文学翻译表面上的重出与复译现象，背后往往深藏着的是译家间的意气之争与出版界的公私轇轕。这其中，俄苏名家名作是重点“抢夺”对象。焦菊隐的契诃夫、高尔基译事即为代表性事件，某些译者会觉得自己圈定的译介势力范围遭受了侵犯；新华书店对人文社和私营出版社的厚此薄彼更是屡见不鲜。巴甫连柯、狄更斯等作家在当代译场中的位置显然比不上高尔基、契诃夫，多一种还是少一种译本也就引不起大规模的争议；郑永慧、吴钧陶这些译坛新秀显然比不上更具名望、更有市场号召力的译界前辈宿老，后者方能“诱”得出版社的拉拢。此外，尚需说明的是，平明出版社如何看待复译，与巴金对复译所持观点不完全吻合^③；巴金、楼适夷等作为文学译者的视角与诉求，也异于沈志远、胡愈之等当代出版界文化官员的看法。正如方今所言：“译者各有风格，读者也各有偏嗜，例如名厨烩炙，取材相同，其味各异。制者匠心独运，食者不厌重复。或各有所爱，或各有所趋。得他山攻错之益，未尝不是重译书的好处。”^④可惜这样的理想状况很难实现。

四、平明出版社的文学翻译丛书

平明出版社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且大都得以完成，与那些“虚报出版计划”^⑤的出版社不同。不少翻译计划都交织着制定者的苦心和定力，某些长期规划又以丛书的形式呈现。平明出版社的丛书，持续时间长、翻译质量高、文学经典多，自然也就销量高、影响大。其出版过的丛书包括：“新文学丛刊”“新中国文艺丛书”“文学丛书”“电影文学丛书”“新时代文丛”“文学译林”“新译文丛刊”“近代文学译丛”“苏联戏剧理论丛书”^⑥。其中，“新文学丛刊”“新中国文艺丛书”“文学丛书”以收入新文学创作为主；“新时代文丛”创作和翻译均有；“文学译林”“新译文丛刊”“近代文学译丛”是清一色的翻译文学丛书。

“新时代文丛”由平明的特约编辑黄裳和潘际炯主编，共分四辑，每辑数量不等。就像丛书名“新时代”所示，这套丛书着实应和着时代共名。从《俄罗斯是“光

明的诞生地”》（唐维光译述）、《世界上最先进的体育运动》（慧文译）到《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潘际炯译）等，亲苏反美的倾向十分明显。介绍苏联文艺的译作有慧文翻译的《列宁斯大林论文化和文化革命》和《斯大林与苏联文学问题》。“近代文学译丛”的“近代”二字只是泛指，所收译作多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美国等当代作品。穆旦译的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即位列“近代文学译丛”。

王西彦曾建议平明最好能再出版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事实上，平明在文学翻译的择取向度上有趋时的一面。在苏联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对斯大林奖金的获奖作品，大多数出版社是一哄而上。平明的译介也不遗余力。为求快速出版，多从英文转译。安·柯普嘉叶娃的《阿尔查诺夫医生》（海岑译）、乔奇·古立亚的《萨根的春天》（成时译）、尼卡莱·诺索夫的《维惕亚·马里耶夫就学记》（宛如译）、密·古谢因的《巴库油田》（李济生译）等作品均是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译自《苏联文学》月刊英文版、法文版的译作更是层出不穷。“近代文学译丛”中还译介有法斯特、阿兰戈登、麦·哥尔德、亚·萨克斯顿等美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而且，在译作的前言后记中，译者很快地学会了援引苏联专家的文章，并袭用其阐释思路与话语方式。徐成时译丹麦无产阶级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小母亲狄蒂》，正文前放置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来自《真理报》上的对尼克索进行论析的文章，一篇是俄译本《狄蒂》的后序。吴劳、鹿金译杰克·伦敦，也把译自《苏维埃文学》的长文《一个资产阶级文明的扞伐者》作为“代序”。有译者主动用还不是很老练的阶级分析和人民话语解析作品，如《奥·亨利短篇小说集》（王仲年译的“内容介绍”便提及“暴露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云云。杨苾译自《苏联妇女》《苏联文学》的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其《前记》同是这般：“这十二篇小说多半是正面地或侧面地反映出苏联女性怎样地站在革命的功利主义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对待她底祖国，她底故乡，以及她自己”；杨苾还提醒读者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爱情：“有几篇在表面上仿佛是描绘爱情，但那不是狭隘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而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志与同志间那种

血肉相连的,充满了关切的伟大的爱”。^⑦

假如止于此,那么平明的翻译丛书同其他出版社相比,除了数量上占优,似乎没有多少区别。而巴金亲自主编的“文学译林”和“新译文丛刊”则从根本上提升了平明出版社文学翻译的审美质素和经典意识。“文学译林”由巴金和陈西禾合编,这就是在傅雷眼中条件极严的翻译丛书,只收入了傅雷译作以及杨绛译的《小癞子》、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巴金主编的“新译文丛刊”不仅收有屠格涅夫戏剧集、高尔基短篇小说集、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以及李健吾、文颖译的托尔斯泰戏剧集,还有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A.托尔斯泰、赫尔岑、库普林、果戈里等俄苏作家的译作,对欧美作家的选择也毫不逊色,包括狄更斯、乔治·桑、巴尔扎克、欧·亨利、马克·吐温等。可以说,从“新时代文丛”“近代文学译丛”到“文学译林”“新译文丛刊”,平明出版社的时代色彩逐渐变淡,巴金个人的译介兴趣渐趋凸显,最终展现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外的世界文学景观。

还要补充的是,文生社在巴金离开后,一方面继续出版先前的“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另一方面,吴朗西又新辟“民主德国文艺译丛”,包括安娜·西格斯的《一个人和他的名字》(廖尚果译,1953年)、维利·勃赖特尔的《父亲们》(张威廉译,1954年)、安

娜·西格斯的《第一步》(微庐译,1954年)等。

五、平明出版社的版税稿酬及工资

巴金是建国后为数不多的仅靠稿费为生的作家之一。1949年上海解放后,巴金即下定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会改变”;此后。巴金多次重申:“我靠翻译总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希望朋友们寄款。”^⑧开明书店因公私合营而陷入经济困境,巴金每次在京与顾均正^⑨见面,二人都会聊到开明的经济境况。在与萧珊的家书中,开明的版税也是屡屡被提及,如:“开明的版税已经送来,出乎意外的少”,“开明版税日前已寄来,是算到三月底为止的(这次半年一结),但跟上次三个月结算比,也多不了多少,大概是‘五反’关系,进书的少”……^⑩作家群体对当代稿费制度的改革与变更格外敏感。曹禺在1950年询问巴金版税如何、平明的译书销路如何,还谈到文坛现状:“听说最近文艺书不易卖,老舍先生的版税简直没有多少,他大感困难。”^⑪不领工资、甚至少拿版税的巴金坦然地做好了心理准备,“看情形,下半年版税会大减”,“不过我们好好用总可以勉强够吧”。^⑫

正因为对于稿费之于作家生存的重要意义有着切身体会,巴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和保障其他作家的稿费权益。以现代时期的文生社来说,“对作者则是不买稿,实行版税制”,“书稿印出按书的定价百分之十五付给作者版税。一年分两次结账,照销售清单售出多少,结付多少。绝不拖欠”。若作者生活上有困难,还可预支版税,或按月领取一定的生活费,“俟书稿印出销售后再逐步扣还。”^⑬曹靖华、沉樱、毕矣午等许多在文生社出书的作家都曾写信给巴金表示已按时收到版税。当得知巴金脱离文生后,焦菊隐除了怀疑文生社出书的标准能否维持,另一层忧虑就是文生还能否逐月送结版税。很快,焦菊隐的隐忧变成了现实。1950年,“文生社五月份薪水发四分之一,六月份发二分之一。书排好印不出,存稿在百万字以上,朗西天天在说没有稿子,此外一事不做。”^⑭文生社可预支稿费的传统也被截断。巴金只能感叹道:“不‘预支’版税,以后也就不会拉到好稿子。现在别的地方都‘预支’版税,谁还愿意白白为文生社写稿、译稿?”^⑮

易彬在考索穆旦的物质基础(平明的稿费 and 南



开的工资是穆旦1950年代的主要收入)时,引用陈明远先生的论说,即认为1953—1957年全国使用的是印数定额制的稿酬模式^⑥。事实上,1956年以前,稿费制度一直处于标准不一的混乱状态。大部分私营出版社(包括公私合营的三联)都在沿用民国时期的版税制,只有国营出版社效仿苏联,施行定额制。其中,平明出版社依然是版税制。可预支,且版税可观,按时发放。汝龙就曾很快地收到稿费,“当天下午就收到壹万叁仟元人民券(合金元拾叁万),虽查不出谁汇的,我们都料定只有您才会那么热心。”^⑦当萧乾需要预支版税时,巴金也尽可能地满足他,“我知道平明经济困难,我也对萧讲过了,不过他需要钱,总得寄点钱给他。”^⑧陈良廷也说:“巴金开的稿费很高,我们当时第一本书《都会一角》,定价一万零四百块,折合成新的人民币一块零四分,定价的百分之十二给我们,这样一算,印三万本书就有三千六七百块。这等于就是版税,当时叫千字千册。”^⑨与陈良廷相比,傅雷这样的名家的版税可以达到15%^⑩。除了著译者的版税权益,平明出版社也极力保障了编辑人员的编辑费和工资。黄裳和潘际炯作为“新时代文丛”特约编辑,尽管不支薪水,但平明将文丛各书定价的1%—2%作为二人的编辑费。巴金本人自1940年代后期起没有再领文生社的薪水^⑪,开明的版税断断续续,数额有限,“平明版税不多,仍作购书费”。巴金更是一再调低自己的版税,“这样书价也可以减低一些”^⑫。

结语

在文学译介与出版上成果丰硕的平明出版社也未能避开琐碎的人事纠葛^⑬。这也和文生社一样,搅动着巴金的心绪:“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可是像平明那样的人事纠纷或者舒服的生活会使我写不出东西来的”^⑭。尽管如此,朋友们对平明出版社,却是由衷的尊敬和热爱。在萧乾眼中,平明出版社代表着书店与作家之间的友谊。当得知平明要被归到公营里去时,穆旦也感到意外,“一变而为公营,这些就要全没有了,令人惋惜。对于巴先生和你来说,多少可以作为自己事业的依据是不是?但这既然是大势所趋,也只好任由它去了。”^⑮1956年,在大势所趋的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至此,私营出版社全部被取消,出版事业的

民国延续被截断。文学翻译结束了建国初期的混杂局面,正式进入了翻译计划化、一体化的框范。平明出版社的诸同人也都四散流徙:转入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者,往往得不到重用;政治运动接连袭来,不少人坎坷颠沛、晚境不佳;亦有豹隐者,寄怀于翻译,如“文革”中祝庆英之译《简·爱》、巴金之译赫尔岑……

1957年,“百花”时节,蓝钰批评出版体制“统得太死,统而不通”,并提出将“新文艺和平明分开,以扩大作家发表稿件的园地,避免垄断”。^⑯这条建议没有激起多大反响,提议者本人也很快不再能发声。平明出版社的历史行旅终究画上了句号。

注释:

① 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68—169页。

② 参见《平明出版社第一次综合报告》与《上海平明出版社关于综合报经营状况及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引自李秀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平明出版社》,《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报告中涉及董事、监事等职务时,多用作家本名,如李芾甘、陆清源;涉及编辑等文学职务时,则用作家笔名,即巴金、海岑。引文括号中的内容,为李文所加。李文中的“李彩臣”,应为“李采臣”。

③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5月,由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在上海创办的同人出版社”,同年,“巴金从日本回国,任总编辑。吴朗西任总经理”。1949年下半年,巴金脱离文生社。参见吴念圣编:《吴朗西年谱》,收入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吴朗西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

④ 《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444页。

⑤ 《黄洛峰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同上书,第432页。

⑥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⑦ 《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524页。

⑧ 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3页。

⑨ 吴朗西(1904—1992),重庆开县人,现代出版家、翻译家。1935年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并任总经理。据李济生的描述,抗战胜利后,吴朗西“以合作之名,借银行之基地,再向商业领域谋求发展”。吴朗西“这时他对文化出版事业已无多大兴趣,仅仅挂个虚名而已”(李济生:《追思吴朗西》,《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这与巴金对文学与出版事业的追求和规划分野较大,二人遂产生了不少矛盾和误会。1946年,“经朱洗从中斡旋,协商决定文生社的社务暂交巴金全面管理”;1950年代初,丰子恺也曾写信试图调解巴金、吴朗西的关系

(参见吴念圣编:《吴朗西年谱》)。

⑩转引自张泽贤:《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 1935-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

⑫黄裳:《琐记》,李致、李舒编:《巴金这个人》,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第77页。文中没有明确提及时间点,倒是黄裳看到巴金正在译《迟开的蔷薇》,因此,所述争吵应是1940年代中期事。黄裳说自己“枯坐一旁,始终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

⑬《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74-276页。信中的“小康”即康嗣群,于1949年至1950年初短暂担任文生社的总经理。

⑭巴金似乎不太希望有关文生或平明的纷纭公之于众。新时期在编纂自己的文集、选集时,巴金对一些文章稍作删节、调整或替换。如《六人·后记》,巴金说:“《六人》在‘文生’出版时我写过一篇较长的《后记》,骂吴朗西,该书再版时我颇后悔,觉得骂吴未免太小器,便另写了一篇短的《后记》。编入《序跋集》的正是我删改过的《后记》……”(1989年8月2日巴金致王树基,《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28页)。如1951年的《何为·再版题记》:“我手边正放着昨天收到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先生私人印发的攻击我的小册子……”,该题记未被收入《巴金全集(第十七卷)》。再如田一文的《海一样的胸怀》述及1940年代后期巴金与文生社的相关人事,此文某些部分由该书责任编辑“遵巴金1988年10月中旬看该书清样时嘱,这里删去一整段,共十二行”(收于田一文:《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7页)。作家本人幽微隐曲的心态往往藏匿于此类文本变迁与改塑中。1980年代初,萧乾应约写一篇回忆巴金的文章,萧乾知道老友不赞成将某些人事写入文章,“现在看来至少在‘平明’这个问题上,以及XXX,你绝对不会同意的,尽管我要不指名”,“你也可能制止我写此文。你有此权利”,“如果你不制止,那么在分寸上,在提什么不提什么上,我要重新考虑”(《萧乾文集·书信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39页)。

⑮转引自张泽贤:《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 1935-1949》,第254-255页。

⑯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⑰同上,第276页。王西彦在建国初与丽尼同时任教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下,两人无所不谈。巴金、文生和平明都是他俩的话题。

⑱《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8页。

⑲《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4-55页。

⑳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65页。

㉑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㉒丽尼致李济生信,转引自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第6-9页。

㉓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124页。

㉔据《一九五〇年一月至六月全国出版单位名录表》,平明出版社位于上海汕头路82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第827页。

㉕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业中医师注册名录》,陆士谔在汕头路82号登记行医(参见张文勇、童瑶、俞宝英主编:《上海中医药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1930年代末,汕头路82号“楼下是陆士谔医师的家和诊所;楼上东厢房住着一位老太太,她就是陆医师80多岁的老母亲……正楼不到二十平米的一间就是谭正璧的家……”参见谭篔:《寻找父亲的足迹》,上海嘉定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嘉定文史资料第三十辑》,2012年,第282页。

㉖《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一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㉗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205页。

㉘《全国出版社简明一览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52页。

㉙参见廖序东:《生平琐记》,收入张爱民、方环海编:《人淡如菊——语言学家廖序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㉚祝世康(1901-1982),江苏无锡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同年赴美留学,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法规委员会委员兼代劳工司司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专门委员等。1938年起从事民主活动,曾协助中共的统战工作。解放后,因病在家休养,从事经济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参见刘晓东编:《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㉛汤惟杰采访、丁雄飞整理:《陈良廷、刘文澜夫妇谈外国文学翻译》,澎湃新闻,2017年5月7日。

㉜据吴钧陶自述,陆清源曾以吴没有文凭也无作品向巴金表示反对。这既能显示出平明编辑部要求之严,又能看出巴金的识人之明。参见吴钧陶:《云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

㉝《同志集》,汝龙译,开明书店,1950年;平明出版社,1953年。《秋夜集》,汝龙译,开明书店,1951年;平明出版社,1953年。

㉞傅首对平明出版社的钟情,常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萧乾坚决认为平明应该办,“我如有译作,还是希望给‘平明’”(《萧乾文集·书信卷》,第3页)。曹葆华打算把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翻译出来“送交平明出版社出版,几年来我一直未帮过他们的忙,这就算是第一次吧”(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62页)。

㉟汤惟杰采访、丁雄飞整理:《陈良廷、刘文澜夫妇谈外国文学翻译》。

㊱1956年前后,诸多知识分子在《文艺报》《文汇报》上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批评意见,涉及人文社不尊重作者、拖延处理稿件、翻译稿费纠纷等方面。可参见萧乾:《“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文汇报》,1957年5月20日;类似文章还有蒲夫的《自己人都好办》、张友松的《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上级领导的批评》、王崇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以及张友松的《封嘴记》,分别刊于《文艺报》1957年第八、九、十、十一号。

㊲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42页。

㊳同上,第133页。

㊴同上,第154页。

④张伟：《周作人致康嗣群的一封信》，《黎明即起：2013年笔会文萃》，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④①瞿白音：《前记》，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瞿白音译，平明出版社，1953年，第4页。

④②《新华书店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第783页。

④③参见司徒言：《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文艺报》，1957年第八号。

④④黄裳：《巴金和李林和书》，《来燕榭文存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14页。“巴金的藏书，非常鲜明的特点是西文藏书种类杂、语种多、版本丰富、珍本多。”参见周立民：《漫谈巴金藏书》，《文汇报》，2014年11月24日。

④⑤《萧乾文集·书信卷》，第3页。

④⑥翻检《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提及购书事颇多。巴金购书兴趣尤集中在俄国古典文学（各类插图本）、苏联小说以及各类字典等工具书。

④⑦有关当代时期文学翻译的译校问题，可参考操乐鹏：《“译校”的理论探讨与制度践行——在当代（1949-1966）翻译文学史视域中的考察》，《现代出版》，2019年第4期。

④⑧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40页。

④⑨同上，第85页。

④⑩这件事也成为郝运的心头之痛，“心想哪天我有机缘能翻译这部名著，一定要把这些差错纠正过来。”参见管志华：《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④⑪丽尼致李济生信，转引自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第6-9页。

④⑫参见老舍等：《写给巴金》，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08-109页。

④⑬巴金致徐成时：“关于改萧珊译文你不需要解释。我写文章时根本未想到那件事。你如早对我讲起，我会劝蒋路用水夫的译文。我喜欢萧珊的译文，只是个人喜欢她的文笔。我说过那不是普希金，但值得一读。不过我并不希望别人多读。”（巴金：《供简新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

④⑭参见杨苡编注：《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④⑮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翻译通报》第三卷第五期，1951年12月15日。

④⑯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120-121页。

④⑰后来焦菊隐不再翻译这几部剧本，也有避开重译本缘故。他在信中如是解释：“近一二日文化部所拟出之‘苏联文艺丛书’中，已列入茅盾之《俄罗斯问题》，并决议由弟代校一遍，所以更不能再译了，奉闻。《前线》也收入那个丛书中。该丛书有《A.托尔斯泰小说集》，文化部决定交弟译，已动手十分之一以上了。”这套“苏联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包括：主编曹靖华，副主编蒋天佐、金人、姜椿芳，编辑委员有戈宝权、李雾野、董秋斯、焦菊隐、陈冰夷、张铁弦、朱葆光、叶水夫、蔡芳信，编辑顾问罗果夫。焦菊隐也被吸收入这批俄苏文学译介干将的群体中。该丛书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包括：拉夫列尼约夫：《美国人民的声音》（洪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维什涅夫斯基：《难忘的一九一九》

（李雾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A.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册》（焦菊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A.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二册》（焦菊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等。

④⑱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124页。

④⑲焦菊隐译毕交给天下图书出版公司的高尔基剧本不是信中所说的“两个”，而是三部：《骨肉之间》《夫妇》和《布利乔夫》，都出版于1950年。焦菊隐译介的苏联剧本《爱国者》也由天下出版，即劳克的《爱国者》（1950年）。四部译作均被收入天下的“苏联名剧译丛”。文生社即将出版高尔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的焦菊隐译本时，葛一虹处也将《布利乔夫》排毕，为避开译稿的撞车（《未完成的三部曲》内收《布利乔夫》），焦菊隐说“我在中间很为难，与一虹兄交涉，打算赔他排版费，另换其他稿子”，葛一虹想出了办法，“文生的《未完成的三部曲》尽仍可出版。他这里只印一本《布利乔夫》单行本。因为他这里是一套《苏联名剧丛书》，与文生版不生影响”（《写给巴金》，第104页）。《未完成的三部曲》由文生社于1949年11月照常出版。天下的“苏联名剧译丛”还收有：西蒙诺夫：《栗子树下》（荒芜译，1949年），贝洛·贝尔采可夫斯基：《生命在呼喊》（葛一虹译，1949年），包哥廷：《带枪的人》（葛一虹译，1949年），魏尔塔：《在某一国家内》（安娥译，1949年），古曼夫：《光荣》（萧三译，1949年），V. 维什涅夫斯基：《难忘的一九一九》（张扬、帅鹏译，1950年），包哥廷：《克里姆宫钟声》（艾丁译，1950年）等。

④⑳孟斧，即贺孟斧（1911-1945），1940年代与陈白尘等人在重庆、成都从事戏剧活动。1941年，贺孟斧与瞿白音在成都相约分译《我的艺术生活》。群益出版社出版的《我底艺术生活·第一部》收录贺孟斧翻译的该书前二十章，故焦菊隐称之为“部份译本”。及至1949年，瞿白音译完后半部，为求译文统一，便重译贺孟斧的部分。焦菊隐此后又致巴金：“《我的艺术生活》我今年不去考虑，将来再说，今年手头工作未完，还谈不到别的。白音译的如果可用，尽管出版。”（《写给巴金》，第109页）瞿白音的全译本由平明出版社收入“新译文丛刊”，于1952年出版，即史达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作者名的音译和书名有微调。瞿白音译本的1956年新文艺版又恢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译名，新文艺版同时删去了平明版的译者《前记》。

④㉑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125-126页。

④㉒《出版总署关于尊重作家的劳动使一切有价值的书籍都能得到出版发行机会的通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④㉓《新华书店1953年工作情况和1954年的方针、任务（摘要）》，同上书，第143页。

④㉔《陈克寒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工作致有关部门及负责人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④㉕《出版总署关于尊重作家的劳动使一切有价值的书籍都能得到出版发行机会的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第231页。

④㉖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陆续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有：《海鸥》（丽尼译，1954年）、《万尼亚舅舅

舅》(丽尼译,1954年)、《樱桃园》(满涛译,1954年)、《三姊妹》(曹靖华译,1954年)、《伊凡诺夫》(丽尼译,1955年);此外人文社还出版有《契诃夫独幕剧集》(曹靖华译,1954年)、《契诃夫戏剧集》(曹靖华等译,1960年)等。

⑦参见《雪泥集:巴金致杨苾书简劫余全编》。其中,杨苾提到“捷克瓦普察洛夫诗选”,瓦普察洛夫当为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诗歌的当代译本主要有:《瓦普察洛夫诗选》(林繁、圭木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瓦普察洛夫诗选》(周煦良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斯米尔宁斯基 瓦普察洛夫诗选》(孙用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年)等。

⑧郑永慧:《往事》,杨绛等著:《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⑨郑若麟:《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我的父亲郑永慧与〈九三年〉》,《文汇报》,2004年4月30日。

⑩藏书家韦决曾经淘得《圣诞欢歌》吴钧陶译本,以及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5月新一版一印的汪译本。在吴译前已有汪倜然译本,韦决觉得,“但平明出版社仍认为好的原著不妨有多种译本,并果断出版吴译本”(参见《淘书路上:韦决淘书札记精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事实上,对比一下焦菊隐之复译事,不难见出:平明出版社对待多种译本的态度并不明朗,也不是一贯的支持。汪倜然(1906—1988),安徽黟县人,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英文专修科。建国后,汪除译有《圣诞欢歌》外,还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戏剧《现代喜剧 第一部·白猿》(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现代喜剧 第二部·银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等。

⑪巴甫连柯《草原上的太阳》的当代译本主要有:《草原上的太阳》(焦菊隐译,平明出版社,1950年)、《草原上的太阳》(蒋虹丁译,正风出版社,1950年)、《在草原上的太阳》(牧原译,文光书店,1951年),以及《草原上太阳(俄语简易读本)》(柳楠注释,商务印书馆,1965年)等。

⑫当代时期有关苏联短篇小说的译作有:《苏联短篇小说选》(施落英编,启明书局,1949年)、《烽火中的苏联妇女 短篇小说选》(水夫等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苏联短篇小说选续集》(徐蔚南译述,商务印书馆,1950年)、《一个学童的日记——苏联最近短篇小说选》(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外国文学组编译,晨光出版公司,1951年)、《苏联短篇小说集 台湾云雾》(桴鸣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周煦良等译,晨光出版公司,1952年)、《走集体化的道路》(朱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等。

⑬新时期,项耀星也翻译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金致藏仲伦的信中说:“项耀星同志的全译稿一次在人文出齐,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他这样做是得到我的同意的,而且我把英译本借给了他。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翻译下去了。我喜欢赫尔岑的回忆录,自己不译,就不应当阻碍别人翻译。让读者早日读到全书,才是我的心愿。”(参见巴金:《佚简新编》,第238页)读者本位贯穿于巴金一生的翻译志业中,构成了巴金看待重译的出发点。

⑭方今:《谈谈文学名著的重译》,《翻译通报》第三卷第三期,1951年9月15日。

⑮参见方厚枢:《出版工作七十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0页。

⑯“苏联戏剧理论丛书”似乎只有一本,即丹钦柯《文艺·戏剧·生活(新译本)》,焦菊隐译,1953年。

⑰杨苾:《前记》,阿·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性格》,杨苾译,

平明出版社,1953年,第1—2页。

⑱《佚简新编》,第78—81页。

⑲顾均正(1902—1980),浙江嘉兴人,现代科普作家、翻译家,也是现代科幻文学的早期著译者之一。1928年进入开明书店,1930年代与夏丏尊、叶圣陶合编《中学生》杂志。新中国成立后,顾均正随开明书店由沪迁京,主持开明工作。公私合营后,顾均正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

⑳参见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1、71页。

㉑《曹禺致巴金信》,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同是曹禺,在1958年附和降低稿酬的呼吁,发表《必须减低稿费 and 上演报酬》一文(参见《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㉒参见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6页。

㉓李济生:《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第42页。

㉔《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7页。

㉕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3页。

㉖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穆旦在平明的版税,应当与同时期傅雷等人相同(或相近),为15%。按照穆旦译著的销量,即便是12%的版税,也是很可观的收入。

㉗陈建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 信函卷·第1辑》,第211页。

㉘萧乾1952年1月15日致巴金:“再者,你能请‘平明’在年前寄我一部分版税吗?搞电影以来,没写稿,有点小饥荒。能在月底以前最好。”(《萧乾文集·书信卷》,第2页)随后,1952年2月21日,巴金致信萧珊:“请告采臣,萧乾刚刚在电话中提到要向平明支点钱。”参见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28—29页。

㉙参见汤惟杰采访、丁雄飞整理:《陈良廷、刘文澜夫妇谈外国文学翻译》。

㉚1952年傅雷致宋希(宋淇的弟弟)信:“巴金的条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他是反对新办法的。”(《傅雷文集 书信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第216页)巴金和傅雷都不赞成稿酬定制。

㉛巴金1949年致萧珊:“文生社的薪水我始终说不要,小康如了解我,似不应当送来。你退回去很好。”参见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3页。

㉜同上,第153页。

㉝且举一例,巫壬坤致萧珊信曾说:“尤其希望你不要为了我(任何理由)和平明吵架,希望你尽量尊重编辑部的意见,如果你的‘太上编辑’的职权运用得过火,我以后就没法给平明搞下去了。”(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68页)其中隐约透露出萧珊作为巴金夫人参与平明出版社事务而带来的与编辑部的细微不和。

㉞李小林编:《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68—169页。

㉟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第62页。

㊱《文化部召开直属出版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纪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蓝钰(1919—1966),时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对出版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后被打为右派,1966年自尽于北大荒。